

主编 雷志雄

中国历代书法精品观止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书法精品观止

● 隶书卷



主编\雷志雄

撰稿\雷志雄 陈新亚 魏开功

摄影\王岳君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中国历代书法精品观止·隶书卷

主编 雷志雄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印张：15

开本：880×1230 毫米 1/16
插页：5

版次：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140

定价：38.00 元

书号：ISBN 7-216-01978-4/J·57

隶书之始于何时,因何而始,历代陈赘不鲜,近世众说纷纭,连篇累牍,愈辨愈晦。近年,云梦睡虎地、天水放马滩多有简牍出土,综而考之,隶书始于战国之末,已可定论。以古物证古人言:西晋卫恒“隶书者,篆之捷也”(《四体书势·隶势》),当非虚语,东汉班固“苟趣省易”(《汉书·艺文志》),许慎“以趋约易”(《说文解字·序》)之说亦确当不疑。由是复可证汉字由甲骨而篆籀而隶书这一书体单线演进说之误,更可见隶书由程邈所创说之谬。

“苟趣省易”,“以趋约易”为文字发展之必然。隶书之创造性成果,乃在实用与审美之矛盾间,避开文字结构日简之大势,而将其点画形态之变化由自然引向自觉,使之日益丰富且与书写之生理机制协律。由是而形成之笔法形式,为此后草、行、楷书发展拓展出一宽阔之路。

隶书一体之演化,概其经要,有简牍墨迹、碑碣刻石、文人法书三大系列。本卷所收 60 种,上起于开八分而孕章草之居延简牍,下止于师古法而创新境之缶翁法书。其间波澜迭起,高峰兀立,尤以汉、清两代,巍然丰碑,首尾遥应。

汉代国势强大,开丝路而有居延、敦煌、武威简牍之迹,辟栈道而有《石门》、《西狭》、《郾阁》刻石之颂。文化繁荣而有《诗》、《礼》之抄,《石经》之立。独尊儒学而有孔庙碑群之起。夸富厚葬而有碑碣如云之盛。

魏、晋以后,楷书大行,隶不多用。虽有《广武》之雄,《宝子》之奇,李(李隆基)、史(史惟则)之润,韩(韩择木)、徐(徐浩)之丰,然已非堂堂大汉风神。宋、元、明三朝,隶法荡然,虽米(米芾)、赵(赵孟頫)亦不合古,俞(俞和)、宋(宋珏)更趋迎俗。降及清初,承袭明季之风,尊崇董(董其昌)、赵(赵孟頫),

隶书几无可观者。

清乾、嘉之后，考据之学日盛，金石出土日多，碑学渐起，隶书又兴。邓石如开山于野，伊秉绶继起于朝。开百数年超迈晋唐中兴之盛，起千余载隶楷合流薄俗之衰。又有金冬心意与古会，别出新裁。何绍基严整汉法，另辟蹊径。徐三庚间取东吴，奇古流逸。赵之谦意参北魏，独具风神。吴熙载法度森严，清超深沉。吴昌硕傲睨古今，苍茫高浑。更有郑簠、桂馥、杨见山、陈鸿寿等，亦各逞一面风气。巍巍然，磅礴逶迤，重峦叠嶂，一派超轶前人，直接两汉之象。

汉隶之盛，使笔法一变，清隶之兴，开碑学之先，在书法史上其功不没，其意日新。降及当世，从者如云。愚以为若能于汉法度中得气，清意趣中得神，间取魏晋之朴，不染宋元之俗，使文质相含，古今会融，当可振拔流俗，别开生面。是所望也。

目 录

鲁孝王刻石	1
武威木简·仪礼·士相见	4
莱子侯刻石	8
三老讳字忌日记	12
居延汉简	16
刘熊碑	20
嵩山泰室石阙铭	24
北海相景君碑	28
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	32
元嘉元年画像石题记	36
汉鲁相乙瑛请置百石卒史碑	40
鲁相韩勅造孔庙礼器碑	44
张景造土牛碑	47
仓颉庙碑	51
封龙山颂	55
孔宙碑	59
西岳华山庙碑	63
鲜于璜碑	67
卫尉卿衡方碑	72
史晨孔子庙后碑	76
肥致碑	79
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	83
执金吾丞武荣碑	87
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	91
李翕析里桥郾阁颂	95
司隶校尉杨淮表记	99
伯兴妻残碑	103
熹平石经残字	107
阌熹长韩仁铭	110
豫州从事尹宙碑	114
白石神君碑	118
郃阳令曹全碑	122
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	126
受禅表	130

齐太公吕望表 134
谢鲲墓志 138
广武将军碑 142
爨宝子碑 146
好太王碑 150
尔朱敞墓志 153
史惟则·大智禅师碑 157
徐浩·嵩阳观圣德感应颂 161
李隆基·石台孝经 164
郑薰·杨巨源酬于驸马诗 168
金农·吉金题跋册 172
金农·临华山庙碑 176
金农·世说新语 180
桂馥·五言联 184
邓石如·四体帖 188
伊秉绶·题王元章画梅花 192
钱泳·临陈球碑 196
陈鸿寿·七言联 200
姚元之·端午词六首 204
吴熙载·临灵台碑 208
吴熙载·三国名臣赞 212
何绍基·临张迁碑 216
杨岷·易林语 220
徐三庚·八言联 225
赵之谦·龙雀铭·始学篇 229
吴昌硕·八言联 233

鲁孝王刻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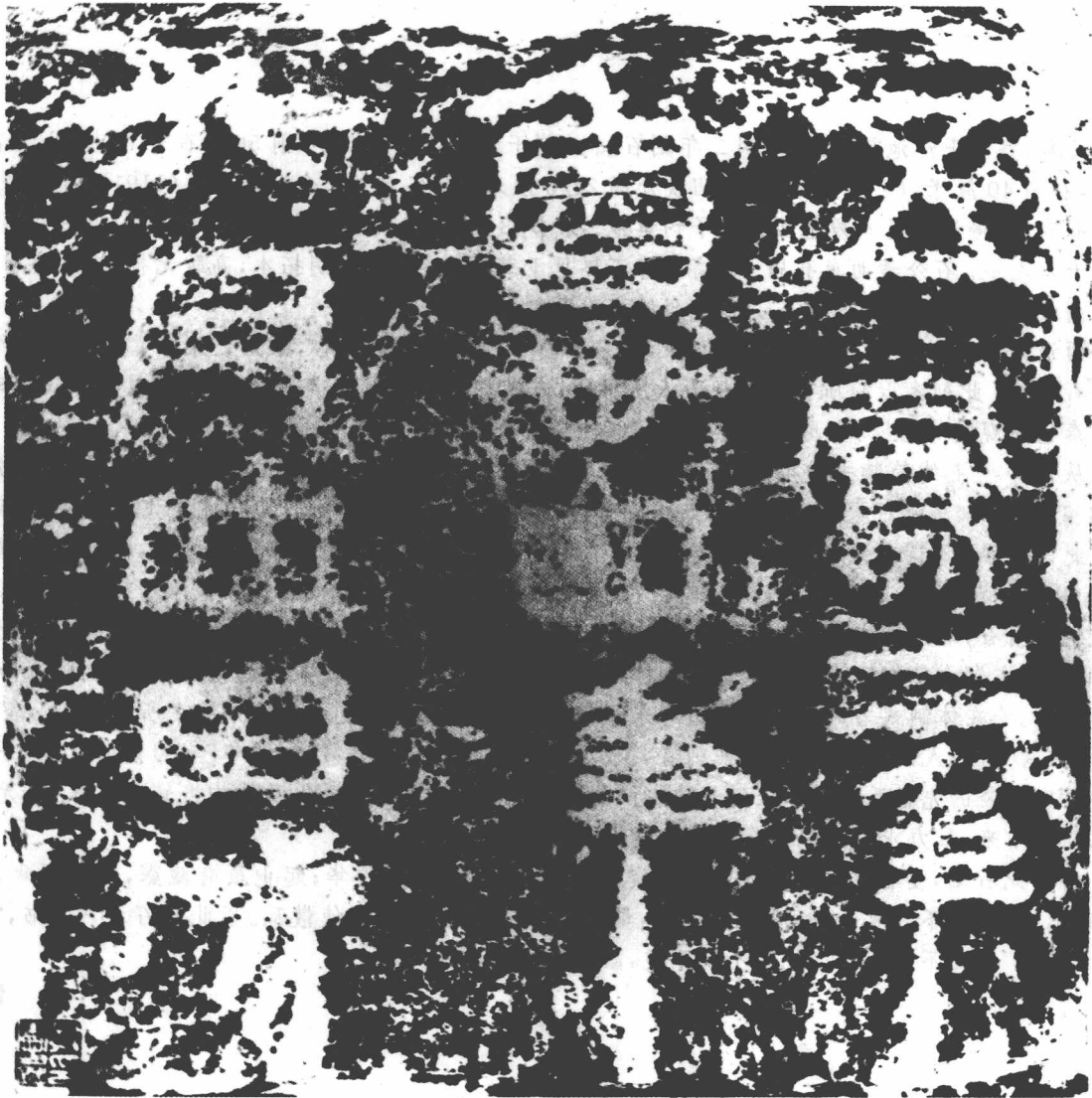
又名《鲁孝王泮池刻石》、《五凤二年刻石》。石刻于汉宣帝五凤二年(前56)。石长70厘米,左高38厘米,右高40厘米,厚43厘米,刻字凹坎处高24.5厘米,宽25厘米。金明昌二年(1191),高德裔监修曲阜孔庙时,得于鲁灵光殿基西南太子钓鱼池。隶书,3行,前2行各4字,后1行5字。出土后刊高跋一则于石左下。石今藏曲阜孔庙。明清以降石屡见于著录。最古者为明拓本,高跋无损,李木公曾得一本。高跋断裂者,为清乾嘉拓本。另有余姚张氏翻刻本传。

西汉刻石传者甚少。其初,书承秦隶,隶杂篆意,即所谓“浑沦朴古,隶法之未雕凿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此刻素以简质古朴之气为人所推重,方朔誉之曰:“无一字不浑成高古,以视东汉诸碑,有如登泰岱而观傲峽诸峰,直足俯视睥睨也。”(《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

从近世出土的简牍书迹看,西汉昭、宣之际,用笔强调波挑,结体趋呈扁横的八分书已近成熟。1973年出土的《居延甲渠候官五凤二年名籍简》与《鲁孝王刻石》同年书,其波挑之飞举,结体之舒博,足证此说不谬。不同者是《居延甲渠候官五凤二年名籍简》系佐吏以笔墨书于简牍上,而《鲁孝王刻石》则是书丹后精工刻于石上的。石出土地在“鲁灵光殿基西南三十步曰太子钓鱼池”(高德裔跋语),或即此建筑物用石,书刻者亦当非等闲人,至少是世其业之善书刻者,因此,其艺术审美价值远在一般佐吏简书之上,方朔之誉似不为过。尽管如此,此石出现的时期立碑之风尚未兴起,“碑”的完整概念尚未形成,所以无论在体制或书风上都尚未达到东汉碑刻的精致和完美,这就是翁方纲之所谓“未雕凿”。但这“未雕凿”为后人的眼光,当时的书刻者实极尽雕凿之能事。试看第一行“年”字四横的波挑;一二行两“年”字长竖的先轻后重且夸张延长;末行“成”字戈钩的用笔起落变化及结构换转势向等等,无一不是从简牍中来,且力求表达笔墨在简牍上的书写趣味。

研习此石刻,要在从残泐漫漶中体味笔意。用笔宜沉着,忌浮华;起止虽有藏露,但宜厚重,忌轻俏;行笔涩进,但不可故作抖动。体势团结,虽偶出波逸纵肆意,亦勿使散乱。以此刻石之意作书,“杂篆势,无波磔”之说不可盲从。见有不伦不类,墨浊笔滞者,即病于此。

雷志雄





简木质，通高约 55.5 厘米，宽 0.77 厘米。一简分上、中、下 3 行，行 20 字，书《仪礼·士相见》16 简。1959 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磨嘴子 6 号汉墓，现藏甘肃省博物馆。将所书文字与今传郑玄注本和贾公彦疏本相参校，此简所据为西汉后（仓）氏本，抄写时代当在西汉昭、宣（前 86—前 50）之世。

此简所书文字为儒家经典，其章法之严整、体势之规范、笔法之娴熟是汉简中难得一见的精妙之作。谓其严整，但能协调，一行中让繁敛简，调度合宜。谓其规范，而不板滞，挪让错落，颇具匠心。谓其娴熟，然不浮滑，落笔沉实，行藏有度。人每论及简书，多谓因出自下层官吏或民间写手，难免粗拙荒率，实未必然。此简即为一例。

研习此简，要在把握其结体及用笔特点。结体上取横势仅是其皮相，重要的是不取左右平匀对称之势，将中宫左挪，造成险势，而又以右向的波挑化险为夷，奇正相生，动静协和中姿态自显。上下结构似不刻意经营承接关系，重上轻下，仅在中、下处以一二或浑或逸的主画使之稳定。左右结构多擒左纵右，左稍长而右略宽，在欹侧顾盼中使之平衡。

用笔须随结体势向，起落变化。点宜圆浑，偶作挑势；横多细劲，或重落平出，或直入波出；竖多不长，宜浑而重，重落侧入，轻起勿收。撇起落行止如竖同，放胆写去，不可迟疑，以求浑而丽，劲且腴。捺多轻入即重下后波出，行笔迅疾，然波出忌利、忌浮。钩平出者宜缓缓送到，踢出者则一驻而去，务求爽利。

此简文字原大不足 1 厘米，起落行止间的节奏变化全在指间运行，可见书者对工具和材料把握的准确娴熟。临习时不妨稍稍放大，先以寸余大小临习，努力还原其结体、笔法，惟肖是求。若再大至二三寸，则须留意勿使流于散漫浮滑。字大，神气纠结不起则散，指腕协调不合则滑。小字放大写，还易失之粗拙，难于写得精到。故在临习时，应在起止中将指间的技巧动作转换为指腕间的动作，这种转换非技巧熟练而不能。

一说古人书简，左手执简，右手执笔，若是此法，笔与简的接触不可能是垂直状态，故中锋之用于简书，未可全信。临习时，用笔尤须灵活运用笔尖与笔腹。虽不拘于中锋，然在偏侧取势中，不可一味直拖横刷，作浮浪少年游行街市，全无纪律状。

雷志雄

士相見之禮聖王用禮夏用布衾極其之曰果也

聖王用禮聖王用禮聖王用禮聖王用禮聖王用禮

聖王用禮聖王用禮聖王用禮聖王用禮聖王用禮

聖王用禮

聖王用禮聖王用禮聖王用禮聖王用禮聖王用禮

聖王用禮聖王用禮聖王用禮聖王用禮聖王用禮

聖王用禮聖王用禮聖王用禮聖王用禮聖王用禮

聖王用禮聖王用禮聖王用禮聖王用禮聖王用禮

聖王用禮聖王用禮聖王用禮聖王用禮聖王用禮

聖王用禮聖王用禮聖王用禮聖王用禮聖王用禮

見三人對一真子

一就與真得志

人對一真子

由是果于心中

吾子又得明焉

一息之精能明

莱子侯刻石

又名《莱子侯封田刻石》、《天凤刻石》、《莱子侯贍族戒石》等。新莽天凤三年(16)二月刻。原石在山东邹县卧虎山下,清乾隆五十七年,为王仲磊发现。嘉庆二十二年(1817)移至邹县孟庙。据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记:“去边纹,高汉尺一尺五寸三分,广二尺二寸七分。”隶书。7行,行5字,共35字。右侧刻颜逢甲等题记3行。

西汉时期所遗留书迹甚少,此石古拙奇瑰,气势开张,苍劲简质,趣味横生,为西汉隶书佳品。透过此石,我们可略窥西汉之书风。杨守敬《平碑记》称:“是刻苍劲简质,汉隶之存者为最古,亦为最高。”

《莱子侯刻石》已接近成熟的隶书。这不仅体现在体势上,也体现在笔法上。在章法上,字疏行密,打破了西汉以前字密行疏的营构程式,注入新意的“经营位置”,为后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同时,行间的界格和四周的短排密线的相续当边,增加了其装饰效果。此石前6行布白较匀,疏密有致,唯第7行最后3字字距密且字大,似与右边格格不入。但这种不经意中,又仿佛寄寓着书者的天真率意。在结构上,中宫舒宕,字体偏扁,力往四周扩张,翻折多姿,松而不散,潇散中寓内敛,奇崛中蕴稳健。前4行字稍正,后3行字欹侧,奇险无比,这仿佛使我们领略到了书者情绪的宣泄激荡。如“食”字,上面“人”未覆其下,而只露“尖尖角”,下部任情挥运,宽绰无比;“百”字横画往右下倾斜,下部横竖较粗重,不论是石之泐剥所致,还是有意加重,它诉诸我们的感觉是情感在奔跃。

此石以篆为隶,意味古雅。横画浑凝简直,痛快率真,无波发之势。竖画直中求曲,曲中求直,刚中含柔。捺画无一波三折,挺直捺出,末端似剑出鞘,如“使”、“支”、“人”等字。带有方框的字如“曰”、“百”、“国”、“毋”等字大多写得宽博而厚实,这种“夸张”不但没使字狂怪奇诡而失衡,反使其稳若泰山。后学追求字“变形”,刻意使其狂怪,结果矫揉造作,反失其真。寓怪诞奇诡于自然之中才显神力、真功,此石整体书风颇近《石门颂》飘逸飞动,又如《封龙山》气宇轩昂,然又拙稚多趣,老辣骨健,这种融稚拙和老辣的笔致凸现出了书者非凡的艺术匠心和造诣。此刻石的精彩动人足以显示了它作为汉隶名碑的撩人心魄的艺术伟力!

魏开功

